

●桐城派研究

论姚莹的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戴 赞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姚莹是嘉道年间具有经世思想的著名官员、学者。姚莹的经世思想及其实践体现在文章著述方面,坚守文道合一,关注现实问题;体现在家族的认识上,主张家族、国家命运相同,家运昌盛以国运为基础,主张从正史中建构祖先世系;重视外国信息的收集,重视国家治理与防务。

关键词:姚莹;经世思想;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21)02-0015-05

收稿日期:2020-01-15

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21.02.003

基金项目:2018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徽学研究资料整理”(AHSKZD2018D08)。

作者简介:戴赞,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大师姚鼐的侄孙,也是著名的“姚门四杰”之一。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开始任职,曾在福建、台湾、江苏等地做官。姚莹做官清廉富有政绩,在闽经常受上司嘉奖,声名鹊起。在任台湾兵备道期间,曾率领台湾军民抵抗英军的侵略。近年来,学界对姚莹的研究成果颇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其生平与交游、爱国思想与抗英保台、哲学及文学、经世思想及边疆史等方面^[1]。关于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学者认为以姚莹为主的青年经世派在桐城兴起,并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对清中叶学风转变起到积极作用^[2]。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姚莹的经世思想进行一些补充研究。姚莹的经世思想不仅体现在文章著述方面,也体现在对家族的认识和中外攻防等方面。在文章著述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济时致用的目的;在家国关系上,主张家运与国运同一,家运建立在国运之上,主张从正史中建构家族祖先,家国一体;在中外关系方面,主张中华与外国在国势上已经逆转,特别重视“夷情”和防务。

一

嘉道年间,政治腐败,时弊丛生,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此种社会现实也深深地刺激了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姚莹作为桐城派的传人,为桐城派

的文风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新鲜血液,从而促进了桐城派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桐城派的文风历来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姚莹对桐城派文风做了整体性的继承以外,还对当世文人士大夫提出了远远超出文风的“体用”观。嘉庆十六年(1811年),姚莹在给自已的至交好友吴岳卿书信中就曾提到:“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总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3]120}

姚莹所阐述的“四端”,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嘉庆十四年(1809年),姚莹接受了两广总督百龄的聘请^{[4]44}。在任职期间,亲眼目睹了海盜肆虐百姓,英人横行侵略。此种社会现实也让他将学问与实践相联系,提出了“经济”之说,所谓“经济”就是经世致用之意。

所谓“多闻”,顾名思义即是见识广博之意。姚莹将“多闻”代替桐城派文论中的“考据”,是蕴含了他对现实思考的深意。乾嘉汉学曾盛极一时,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大都穷经皓首,埋头于故纸堆中。此种学问与社会现实联系甚少,而当时晚清社会所处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大有侵并中国之心。“多闻”也是对只知学习儒家经典而不关心社会实情的一种批判。姚莹说:“取先儒删弃踳驳不经之说,搜而出之以异宝,炫博矜奇,毫发无益实用。末学空疏为所摇惑,群而趋之,咸以身心性命之说为迂疏。”^{[3]124}据此,姚莹认为这种学问只是“末学空疏”,而对现实生活“毫发无益实用”。

不仅如此,姚莹的“多闻”还与自身实践相结合,他一直强调要关注外国的国情,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他自己所言:“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愤败至此耳。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贻误从事而不败者也。”^{[3]273}“多闻”这一点也是与他的经世思想相联系的。

所谓“文章”,即是写作之事。古人云“文以载道”,文章大体上都寄托了作者的思想与精神。姚莹认为文章是继承了先贤们的思想,其主要用途是要立足于实践之中,姚莹在自己的文章中将“道”的思想一以贯之,但最终的创作主旨思想寄托在“功”上。“道足以继先哲,功足以被来兹,若此者已不必传,天下传以被来兹”^{[3]38}。正是坚持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文章才具有非凡之功。文章不仅培育价值观,引导着价值取向,维护着伦理纲常,“夫文者,将以明天地之心,阐事物之理,君臣待之以定,父子赖之以亲,夫妇朋友赖之以叙其情而正其义”^{[3]124};文章还要具有现实关怀,要关心世风时情,“文章之大者,发明道义,陈列事情,动关乎人心风俗之盛衰。”^{[3]112}

清朝的科举制是以八股文章取士,而八股文章向来为后世所诟病,由于八股文章框架太严,往往束缚思想。姚莹所提倡的四点要端,具有对八股取士的批评意味,认为科举制是“猥俗浅陋”的末流。“后世学术纷裂,纯杂多门,然一艺之成,咸足通显当时,称名后世,未有猥俗浅陋如近日科举之学者也。”^{[3]120}姚莹认为学者学习古人,不能从现实出发,是误国误人之举。他说:“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3]120}从这一段话也可了解到姚莹对于盲目的学古持鄙夷的态度,主张得其精髓。姚莹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章束缚太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八股文章不能从实际出发,解决现实问题。

乾嘉时期汉学风靡一时,姚莹对于汉学家舍本逐末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枉费精神,并且认为他们毕生从事的文字训诂等工作,其实不过是治学的入门。与此同时,他也批评宋学家们崇尚空疏的习气。他认为“文章一道”,如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经世致用都是无用之言。这一说法也是针对当时中国晚清内外交困的社会情形而提出的。

当面临社会危机之时,学术界需要提出解决危机之道。文风与经世思想是相互影响的,姚莹对以前的治学之道的否定,为清代中后期的治学提供了方向与动力。

姚莹在其著作上也体现了他对经世致用的理解。他的著作包括《康輶纪行》《东槎纪略》《识小录》《寸光阴》等,《康輶纪行》一书是姚莹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体现姚莹经世思想的代表作,从中不难看出姚莹的行文特点。他提倡“沉郁顿挫之妙”而反对“浮率平直之病”^[5]。此书是姚莹被贬官西藏后,为了解决藏僧纠纷,以其出使途中的札记汇编而成。该书全面介绍了西藏的风俗地貌,以及关于西藏周边的尼泊尔、印度等情况。而这本书的出版目的,也是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3]280}。他对英国和俄国在印度之间的武装斗争十分关注,认为“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6]519}。他对于英俄两国各自争夺殖民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可以利用两国的矛盾而达到“制驭”的方针,这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晚清社会来说,可以缓和一下来自外部的压力。由此可见姚莹面对实际情况,不单单是叙述以成作,而更重要的是实现“事功”,谋求独立富强以驭外强。《康輶纪行》这一著作可以看成是和魏源《海国图志》在同一时代经世致用文人的良苦之作。它们最为突出的一点,都是希望国人能够了解外国,破除狭隘的“天下”思想,从而真正地知道“万国”的局面,揭露外国列强的“亡我中华之心”。他对祖国边疆的考察,对夷事夷情的关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著作,是他济时致用文风的重要体现。

总之,文章一道,文道合一,讲求文章著述的经世致用,是姚莹一以贯之的理念。姚莹在著述方面的现实追求,也反映在家谱的编修以及对家国关系的认识方面。

二

在传统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儒士的理想和最高追求。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血缘文化,家族这样的血缘组织比较发达。齐家收族的意思是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共处、共同发展。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编修家谱,尤其是宋以后家族组织庶民化、世俗化之后,家谱的教化功能凸显。编修家谱可以

用来约束和管理族人,实现推行教化、稳定家族和社会的功能。嘉道以降,世风日下,社会矛盾和家族内部矛盾也在加剧,这个时候编修家谱的现实意义就更为重要。姚莹本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于家谱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并将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进行了关联,放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

姚莹在家谱编修方面,坚持家谱与国史是有紧密关联的,这一方面表现在祖先世系的建构上,要以正史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进行详实的考证,实事求是,建构祖先世系;另一方面,同样要依据正史,去除家谱中虚构、攀附、妄冒的祖先,还历史以真实。

姚莹所在的桐城姚氏家族在第五次编修族谱时,编者曾将稿本寄给姚莹,姚莹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和主张。他认为修谱时应该“爰据历朝传表,编其世系,寄存族中备考”^{[3]158}。这是对于世系的解决办法。家谱编纂中最难的可能就是世系的建构。因为如果没有及时记录,高祖以上的祖先实际上很有可能被遗忘,更遑论多少代之前的先祖了,更是难以接续。这是每一个家族长时间不修谱就会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姚莹采取的办法就是,广泛考察正史中关于姚氏历代先人的记载,拟清世系,辨认与本族的关系,从而与家谱所编写的内容相印证。他通过详细考证,指出了本族所修宗谱的错误。他特别强调正史资料对家族世系的意义,反对妄附世系,“人莫不有祖,诬之不可,无其事而为说,犹之夫之诬也。伯昂云遍考传表,何以有此失?良惑于赣州旧谱一言,又不知会稽族谱之无据,辄喜而依附之耳。乌知正史具在,考之固未详乎!此莹所不得辨者也。”^{[3]161}原先修谱之人正是由于不认真查阅史籍,而且轻信旧谱的一家之言,不知道旧谱并没有实据,只是旧谱怎么说他就怎么记,才有这样的失误。并且他批评修谱的姚元之:“伯昂不能援正史以纠其妄,乃反援之以紊吾宗。”

姚莹不仅指出了自己族人原先修谱的错误之处,而且他在修谱时也贯彻了他的一贯原则和方法。即“窃本诸家乘,上求国史,旁采各省郡州县志,及贤士大夫之文,搜辑所闻,编为《麻溪姚氏先德传》。”^{[3]287}姚莹广泛的搜集资料,并且与正史相互考证,务实不务虚。

姚莹不仅给自己本族的族谱中提出要注重实际,不务虚言,而且给别族修谱序的时候同样也是

如此。例如《桐城破冈胡氏宗谱》中,胡氏族人将自己的迁桐世系定于“安定”。姚莹认为桐城破冈胡氏宗谱中对于迁桐胡氏来源记载有误,并且将迁桐胡氏定于“安定”之地提出疑问。“稍有疑似,子皆阙之,谱其所可知,阙其所不可知。然而犹系于安定者,何哉?”^{[3]289}姚莹认为宗谱中缺失的地方,就应该存疑,不应该不加分别地都收纳。并且他进一步指出胡氏族人修谱时可能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即“岂不以凌氏《万姓统谱》总系胡于安定乎,抑未察凌氏之疏乎?”^{[3]290}正是因为胡氏宗族修谱时没有考察明代万历年间凌迪知所编著《万姓统谱》的疏忽而照抄错误之处。从这儿可以看出,姚莹贵疑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

对于桐城破冈胡氏的世系问题,姚莹也给出了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他认为:“然则今兹之谱宜将何系?曰:系之以桐城破冈,则不必远望,而前后乎安定之望……不定所望而望自存,犹愈乎自紊其系也。”^{[3]291}将世系定于桐城破冈,不必攀附其他的地方,将来桐城破冈就成了以后考察的世系所在,如果定于存疑的地方,也会紊乱自己的世系,得不偿失。

在给桐城桂溪项氏作谱序时,姚莹显示出了他的家国同运的经世理念。“呜呼,士大夫家族盛衰,岂不视国运哉!”^{[3]292}他认为一个家族的繁盛与国运是紧密关联的。姚莹的视野不是关注一家的繁荣衰败,而是立足于整个国家进行考察,这跟当时的时局氛围以及经世致用的理念是一致的。并且他讥讽世俗之人道:“每怪世人言,受国恩者必尝为显宦,否则群笑之以为侈妄。曾不思身享太平,得鼓腹于陇亩以繁衍子孙者,伊谁之力?”^{[3]293}

姚莹还注重家族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例如他在《宗谱见存人数记》中就曾说到:“岂族之盛衰又不计以众寡计耶?夫众寡之数存乎天者也,若贤知之事,则人皆可勉。凡吾宗人惟尽其所当为者,以求合于天焉,庶几延世之道乎。”^{[3]385}从中可看出,姚莹从人口数量论及人口质量,认为人口的数量是由上天决定的,但是人口的质量“贤知”是人力可为的,应当尽力去做。这也体现了姚莹的“事功”思想,注重实际生活。

姚莹跳出小我、小家、小族,明确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安居乐业、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撑力量、保障力量来自于国家。从这个意义上,家族不能独立存在,家族与国家是同一个命运,是命运共同体。有了国运,才有家运,家运之盛是由于国运之

盛,国运衰落自然家运衰落。在姚莹的思想中,有一种超乎个人与家族的国家理念,以国家太平、人民幸福为主旨,具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

姚莹这种家国同运的经世理念,既有对传统收族理念的继承,也有对其发展和补充。姚莹对家国关系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其经世致用思想还反映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

三

姚莹为官从政最能体现他经世思想的地方,即是他对“夷情”非常关注。面对外夷,姚莹的防范之心始终贯穿于他的思想之中。他身具忧患意识,从实情出发,讲求立功。同当时的经世派人物一样,他认为了解“夷情”是非常有必要的,如同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早年间他便说:“天下之道,守在四夷,岂可茫然存而不论乎?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6]2}这种对“夷情”的关注也是始于在广州做幕僚期间,当时他与总督松筠交好,从而获得了一些中外信息和域外知识,开拓了眼界,从此开始留心并研究域外和边疆情事^{[4]52}。

姚莹在广东任职期间就对晚清社会内忧外患的局面非常担忧,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不能将国内治理平定,肯定会引起外夷的窥伺之心。在《上座师赵分巡书》中就曾说道:“夫极众力未集之时,不设策诛戢之……且夫粤地内有瑶黎杂处,外有蕃夷往来,我之虚实,彼皆知之,今吾官军骄至不能戢定内贼,不虑有启彼之戎心乎。”^{[3]45}姚莹不仅是对夷情的关注,更加注重国家社会内部的稳定。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姚莹赴闽从政,起先由于闽地民风剽悍难以治理,后来他因地制宜推行相应的政策,使地方得到大治。“俗强悍好斗,盗贼滋多,莹治之严。太宜人戒之曰:古者循吏治术不同,固当因地制宜。”^{[3]95}姚莹在闽地才干突出,被闽浙总督董教增器重,尝称其为“闽吏第一”。随后不久,便升任台湾任职。

姚莹在广东做幕僚期间对于“外夷”非常敏感,他在台湾任职时也有所体现。道光四年(1824年)八月,他曾对夷船滞留鸡笼港贩卖鸦片事情,写信给台湾道孔昭虔,指出要阻止其在台湾的活动,警惕其对台湾的窥伺之心。“夷情叵测,始意不过图售鸦片。……及往来台湾,海道既熟,又见我

海防之疏……能保无他日之忧耶?……又畏夷船高大,不敢驱逐。”^{[3]64}由此可见,姚莹确实眼光长远深思熟虑,认为图谋鸦片利益是小侵吞之心为大,而且提出了对海防的担忧之情。

姚莹在台湾任职时的经历,使他具有了初步的海防思想。由于他积极了解夷情,为随后保台抗英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夏,姚莹在台加强战备,获得了“鸡笼战役”的大胜。“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3]267}这次胜利发生在鸦片战争期间,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击溃了外国的进攻,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此次胜利波云诡谲,朝廷有人参奏姚莹,认为他有“贪杀冒功”之嫌。不久后姚莹虽胜而获罪,这沉重打击了他对朝廷当局的信心,更使他对于国家的前途未来深感茫然。这一点可以在姚莹与好友的通信中略知一二,他感叹道:“举世获罪,独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镇道受赏,督抚无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况以英夷之强黠,不能得志于台湾,更为肤诉之辞。”^{[3]266}此等言论虽然有牢骚之处,但更表现出其满腔的爱国之情与经世之思。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姚莹被贬于四川,并没有就此沉沦,在给光律原的信中说到:“弟不自揣,妄意济世利人……生平多历崎岖,惟气未衰耳。”^{[3]267}如此情况下,姚莹仍怀经世之志,希望还能够济世利人。当时有些官员闭目塞听不留心海外之事,姚莹对此尖锐地批评道:“古今异势,非可拘谈。……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6]358}由此可见,即使被贬偏地,姚莹一直都在关注“夷情”,并说“外夷”都“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有一丝悲凉也有一丝无奈的意味。

在姚莹看来,中华“茫昧自安”,曾经的国势已不再;外夷“勤求世务”,国势蒸蒸日上。时异世殊,华夷异势,他为国运所深忧,正因为如此,他极为重视对国外情报的收集工作,极为重视防务,因为他知道,衰弱的中国正在成为西方列强的口中肥肉,他也只能鼓与呼,并尽己所能,鞠躬尽瘁而已了。

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是在中国社会即将转型时期出现的。这一经世思想风潮的出现是有其大的时代背景,一方面,社会内部矛盾重重,这一环境促使姚莹用经世思想谋求救世之方,另一方面,西学东渐让姚莹眼界大开,丰富了自身的思想资源,

不再束缚于迂阔之习,而是“留心经世学,遇事激昂奋发,锐欲有所为”^[7],关注现实社会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

姚莹的文章著述既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又关注现实,讲求济时致用,注重事功。姚莹主张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相同的,他在祖先建构方面也是以正史人物为依归,实际上是其家族属于国家、家国同运理念的另一种阐释。姚莹在从政方面,深刻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与外国在国势上已经发生了逆转,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当中,因此他尤其重视国家治理和“夷情”防务。总之,姚莹通达世务,关心国计民生,其经世思想一以贯之于修齐治平的每个阶段。姚莹的经世思想虽然没有突破传统经世之学的窠臼,但他已然是当时走在时代前

列的人物。

[参 考 文 献]

[1]洪清云.姚莹研究之回顾与反思[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5):88-92.

[2]施立业.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J].清史研究,2004(2):7-33.

[3]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桐城派名家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4]施立业.姚莹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04.

[5]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3.

[6]姚莹.康輶纪行[M].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0.

[7]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M].易孟醇,点校.合肥:岳麓书社,2008:1136.

责任编辑:陈寿富

On Yao Ying's Thought of Managing the World and Practice

DAI Yun

(Huizhou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Abstract: Yao Ying is a well-known official and scholar with the thought of managing the world during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Yao Ying'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anaging the world are reflected in the writing, insisting on the unity of literature and Taoism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al problems.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family, he advocates that the family and the country share the same destiny,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he family bases on the fortune of the country, and that the ancestral lineage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y. Meanwhile, h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collection of foreign informa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defense.

Key words: Yao Ying; thought of managing the world;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